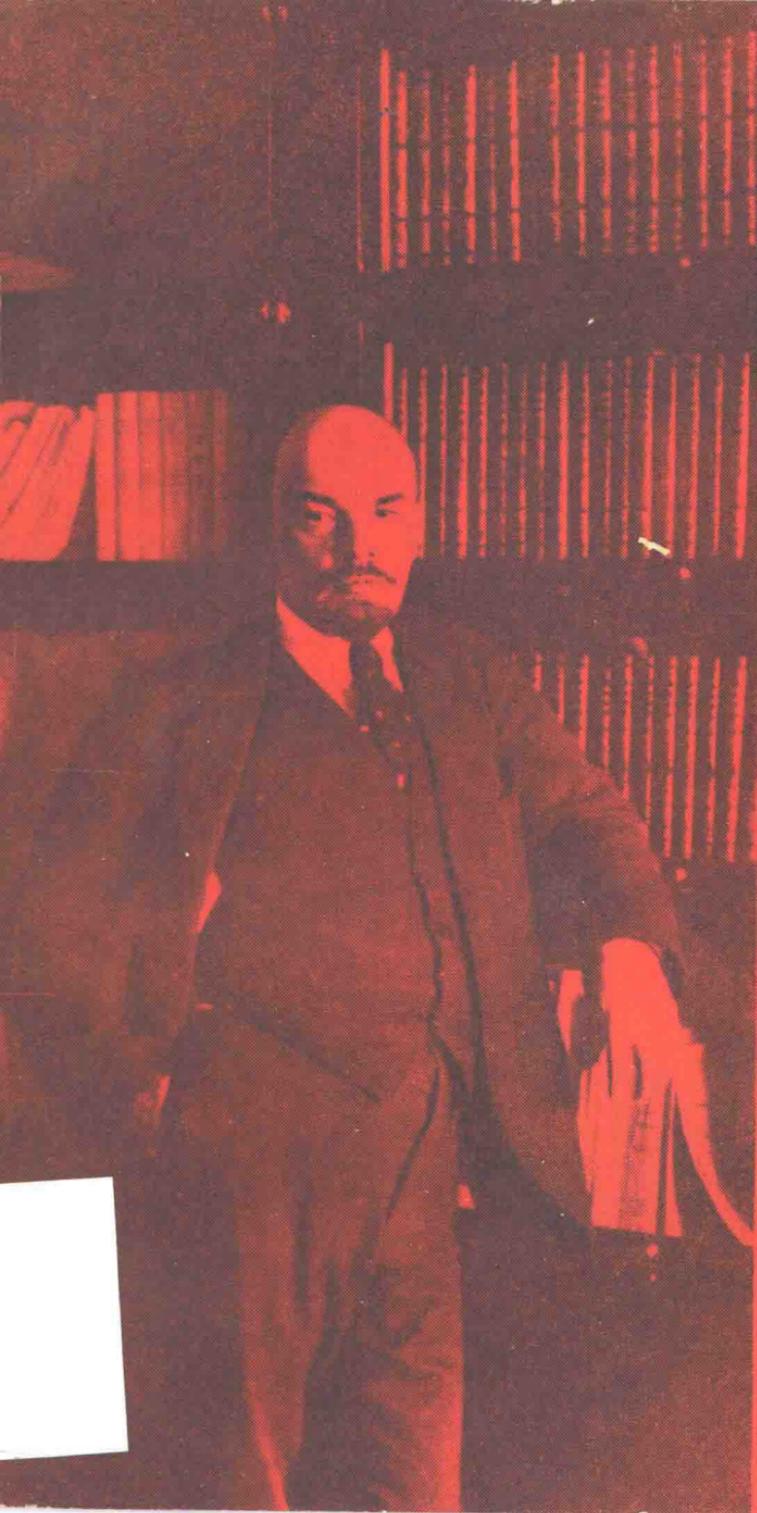


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图书室里



# 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图书室里

(苏)舒·马努查里扬茨 著

蔡 汀 李 黛 译

书目文献出版社

1983·北京

## 内 容 简 介

本书是列宁的图书管理员写的回忆录。书中回忆了列宁热爱图书、潜心读书学习、勤奋工作的感人精神和他那爱同志、爱人民，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高尚情操。本书语言活泼、风趣，故事真实感人，生动地再现了列宁的伟大形象和崇高精神。

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图书室里

(苏)舒·马努查里扬茨著

蔡汀 李曾 谢译

书目文献出版社 出版

(北京文津街七号)

北京市华新印刷厂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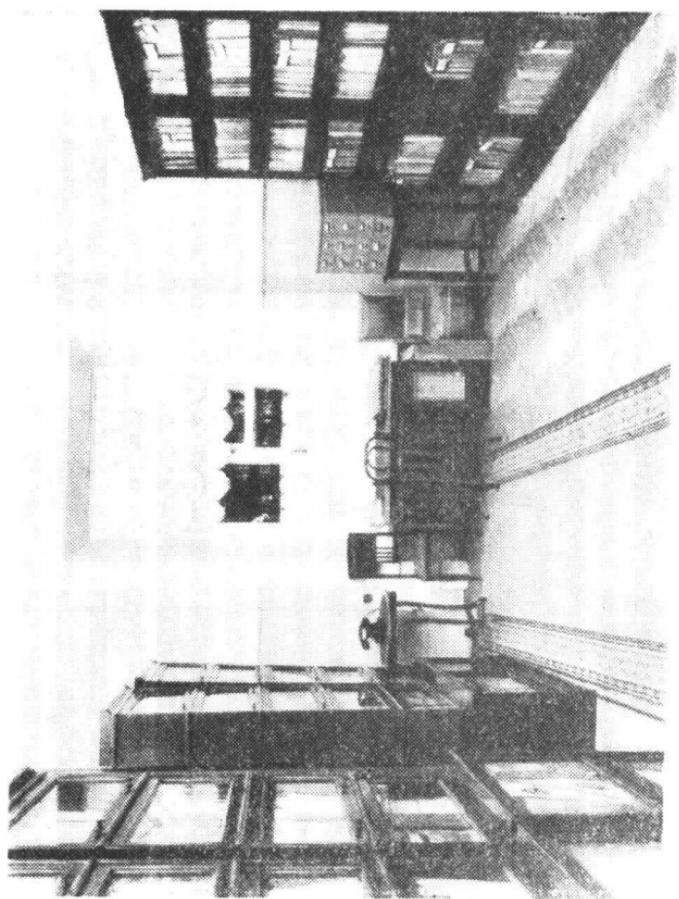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787×1092毫米 1/32开本 3 $\frac{1}{8}$ 印张 70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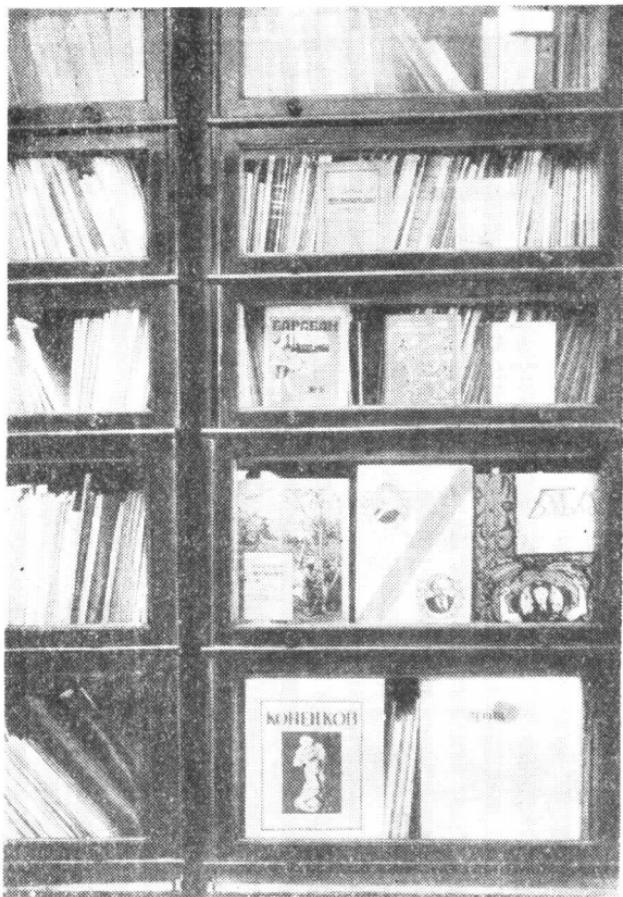
1983年12月北京第1版 1983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12,300册 定价：0.40元

图书分类号：A732 统一书号：7201·52



克里姆林宫里的列宁图书馆



列宁图书室里的书柜

## 代序

关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的每一本新书都会引起读者心灵上的激动。读者往往怀着迫切的心情在翻阅着那些书，是想寻找出一些他们尚不知道的，列宁那可亲可敬形象的新特征，新的细线条。那怕是发现很小的一点点，也显得那么珍贵。在这方面，舒·尼·马努查里扬茨的这本小册子就具有浓厚的趣味。

舒·尼·马努查里扬茨一生感到莫大幸福的，就是她做了三年多的列宁的图书管理员工作。她每天同列宁打交道，实现他的委托，在工作上做他的助手，保证他所需要的图书。对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来说，图书则成了他在不间断的理论与实践的活动中，在为社会主义、为人类繁荣的巨大斗争中的一种战斗的武器。

马努查里扬茨同志在列宁的图书室里工作时，还是个年轻的共产党员，她工作表现十分出色，完成任务准确及时，并有主动精神，这是无可非议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很满意自己的图书管理员。列宁谈到她时，曾说过这样的话：

“没有谁能那样好地为我服务了。”

列宁的图书室就设在克里姆林宫内他的办公室里。图书室并不算大，室内有两千册左右的图书，但这些图书，只有按照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指示或者经他同意才能去整理、排列、增补和更换。列宁对这些书中的每一本，可以说是了如指掌。

马努查里扬茨在这本小册子里讲述了许多有趣的事：讲

到图书室里的工作方法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指示，讲到列宁在书上所做的批注以及他如何珍惜图书，热爱图书，书中援引了许多新的资料来说明列宁既是读者，又是作者。更为有价值的是，作者在这本回忆录里阐述的所有问题的资料，都是援引列宁的文献作为依据的。

读者从舒·尼·马努查里扬茨的这本小册子里，会领悟到列宁的英明果断和严格要求的精神，对疏忽大意和马虎拖拉的作风的那种严厉态度；还会领悟到列宁那和蔼可亲、为人善良、朝气勃勃的性格，以及他的诙谐幽默，对人们和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充满了强烈的爱。

作者援引了弗·伊·列宁关于《一九一九年三月六——七日的第三共产国际》小册子粗制滥造一事给国家出版局瓦·瓦·沃罗夫斯基的一封非常有趣的信，这封信成了列宁工作作风的极好见证。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用尖刻的语言大为愤怒地批评这本小册子编得糟透了，并马上为修改该书而提出明确具体的指示：“我要求：（1）用贴页的办法更正错误。

（把犯错误的人关进监狱，强迫他们贴好每一本书）”

通知我：

（2）甲，印了多少册？

乙，发行了多少册？

（3）改版重印，一定编好，校样送给我审阅。

（4）规定制度，使每一种出版物都有专人负责（建立负责人登记制度）。

（5）制定其他整顿措施，并送给我一份。

人民委员会主席 弗·乌里杨诺夫（列宁）”

马努查里扬茨在回忆一桩桩往事时指出：列宁的阅读兴

趣相当广泛，任何问题无不引起他的注意。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利用过的图书种类极为繁多：有哲学、社会学、党史，有关于各种科学问题的书籍。弗·伊·列宁总是想方设法让自己手头拥有全面开阔他的视野的各种问题的材料。

在列宁的图书室里，图书不仅为他工作之所需，而且是用来作为他紧张劳动的一种缓冲。列宁的工作极为紧张，用他自己的话说，是达到了“疯狂”的地步。当你读到马努查里扬茨同志描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是如何以某种肯定的态度要求给他弄到纳日温的《回忆托尔斯泰》这些地方时，你会不由自主地发笑的。巴纳也娃的回忆录、海涅的诗、歌德的《浮士德》等许多著作，他都颇感兴趣。我有时看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短暂的休息时刻，也到书柜前取出一本书来读，兴致勃勃地翻阅他所喜爱的作者的那些熟悉的作品。

列宁在书上所做的那些批注尤为引人注目。这些批注，非常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去研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读书方法。批注虽短，反映的内容却入木三分。三言两语，几条着重线，都鲜明地反映出列宁的思想和对他所读过的书的态度。舒·尼·马努查里扬茨在书上相当详细地运用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那些批注。我们知道，有一次列宁在翻阅有关莫斯科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工作的小册子时，写了几句话：“经济问题——八，组织问题——四十六。”在页边上写道：“咄咄怪事，应该相反。”多么深刻的教益啊！这里既有批评，又有实际的指示。列宁的作风就是这样。

舒·尼·马努查里扬茨说得对，为全面研究列宁在书上工作的批注，就需要科学工作者的集体劳动。而这本小册子里所引的这些批注，无疑会引起读者的兴趣。

看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每要得到某一本书的愿望都不是偶然的，都是与某一实际需要联系着的。例如，作者举了赫里斯托·卡巴克契也夫的一段叙述为例，来说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保加利亚群众性的宣传书籍是多么感兴趣。这正说明了他之所以要委托图书管理员弄到《保俄辞典》。因此，根据列宁的每一个请求，去详细研究他所需要图书的情况，是大为有益的。

马努查里扬茨同志所叙述的弗·伊·列宁《在共青团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一书的出版过程，可以明显地说明列宁怀着一种何等的爱戴和关切的心情对待我国青年。他不断地号召青年，要不惜自己的力量和知识去学习共产主义，建设共产主义。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整个社会政治和科学活动的特点，就是理论密切联系实际。列宁的科学著作，都是源于生活，而且是与劳动人民息息相关的，顾及着他们的经验的。这些科学著作就是他日常活动的续篇。马努查里扬茨同志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伟大的创举》和《论粮食税》两本著作证明了这一点。

舒·尼·马努查里扬茨在写作过程中，曾得到新闻记者И·Д·莫什宁的大力帮助，因此读来引人入胜。该书将引起你去进一步探讨作者所涉及的问题，仔细研究伟大列宁的创作活动。亲爱的读者，我认为，还是应该由你自己去品评这本书的优点吧。

莉·亚·福齐也娃

## 目 录

代序 .....	1
难忘的一天 .....	1
“有什么新书吗？” .....	7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便条 .....	18
列宁是读者，又是作者 .....	36
“而我应该这样！” .....	62
值班 .....	78
图书是巨大的力量 .....	35
附录：列宁的图书室 .....	92
译后记 .....	99

## 难忘的一天

我常常想起二十年代曾在国家出版局工作的情景，起初做图书管理员，后来当了编委会的秘书。

这个单位当时是由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的一个战友瓦·瓦·沃罗夫斯基<sup>①</sup>领导的。单位就设在莫斯科小尼基塔街上里亚布申斯基<sup>②</sup>以前的一所独用的住宅里。

出版局里的事务很多。要搞好文艺、科学和政治书籍的出版工作，让广大群众能得到精神上、思想上的食粮，因为它能帮助他们更好地去领会无产阶级革命的目的和任务，教会他们怎样具体地去体现伟大而崇高的社会主义思想。

直到现在，我仍记得很清楚：眉清目秀、仪表堂堂、知识分子模样的布留索夫<sup>③</sup>是怎样地沿着出版局的楼梯上楼的情景。当时曾出版了他的一本新诗集。身穿军大衣的绥拉菲莫维奇<sup>④</sup>走了过去，他露出了忧伤的眼神（他的儿子阿纳托利，莫斯科共青团的领导者，刚刚在前线上牺牲了）。宽肩膀的马雅可夫斯基用男低音的声调说着话，出现在接待室里，

---

① 沃罗夫斯基（1871—1923），职业革命家，布尔什维克的著名活动家、政治家和文学批评家——译者注。

② 里亚布申斯基（1871—1943），俄国反动的银行家和实业家，十月革命后逃亡国外——译者注。

③ 布留索夫（1873—1924），苏联诗人，俄国象征派奠基人——译者注。

④ 绥拉菲莫维奇（1863—1949），苏联作家，十月革命后为《莫斯科工人代表苏维埃消息报》编辑委员会委员，小说《铁流》的作者——译者注。

他通常总是拄着一根多节的大拐杖走来，并把拐杖往我的桌子上一放，很有把握地说：

“我找沃罗夫斯基！”

随着嘎噔嘎噔的脚步的响声，三个来访者一下子进了出版局局长办公室。其中一个个子不高、淡黄头发的人，身穿一件斜领衬衫，是诗人叶塞宁<sup>①</sup>……

一九二〇年的春天，我在国家出版局的正常的生活突然改变了。有一次，下班以后瓦茨拉夫·瓦茨拉沃维奇·沃罗夫斯基要我来到他的办公室，他说：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秘书处刚刚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说他需要一个图书管理员。他们问是否能让你去做这项工作？”

我十分激动。“我能在伟大的列宁身边工作吗？能胜任吗？”这个想法立刻出现在我的脑子里。我犹豫起来。当我把自己的想法告诉沃罗夫斯基时，他惊奇地说：

“您怎么啦？谁都想见到列宁，而您有这么个机会，直接在他的领导下工作多好哇。不要怕，您是很熟悉图书馆业务的。喏，您就决定了吧！过半小时，他们还会打电话来，我必须给个回答。同意吗？”

“是的。”我坚定地说。

“这好极了，”沃罗夫斯基一边跟我一起感到高兴，一边说，并调皮地瞧了我一眼，补充了一句：“只是不要太骄傲罗！”

当人民委员会又一次给沃罗夫斯基打电话时，他答复说，

---

① 叶塞宁（1895—1925），苏联诗人——译者注。

我同意了，但暂时还不能让我走。所以最初一段时间我只能晚上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图书室里工作。

第二天，我到了人民委员会。索菲娅·波里索夫娜·勃里奇金娜<sup>①</sup>接待了我。她是主持人民委员会办公厅工作的，由于莉吉娅·亚历山大罗夫娜·福齐也娃<sup>②</sup>正在休假，人民委员会的秘书工作和列宁私人秘书的工作暂由她来担任。

我和勃里奇金娜是老相识了。她知道我早已在党内，爱读革命书籍，又从事图书馆工作。

有一次，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同勃里奇金娜谈话中表示：目前，以他的名字收到的书籍相当多，他一个人来整理这些图书有困难，要求有一个专职工作人员。索菲娅·波里索夫娜说她尽量去挑选一个适合做这个工作的人。列宁同意了。紧接着人民委员会秘书处就给国家出版局的沃罗夫斯基打去了电话……。

于是我就来到了人民委员会里。

勃里奇金娜对我说：“今天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不能接见你了，他出去了。不过，现在为了不浪费时间起见，建议您熟悉一下他的图书室。”

我走进人民委员会主席的办公室，图书室就设在这里。首先，我注意到办公室里的陈设相当简朴。令人惊奇的是图书的数量并不大。我觉得列宁应当有一个巨大的图书室。后来我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经常收到由

① 勃里奇金娜（1883—1957），1917年十月革命时期任莫斯科军事革命委员会秘书，1919年5月起任人民委员会一个办公室的主任，后任人民委员会秘书——译者注。

② 福齐也娃（1881—1975），1918年起任人民委员会秘书，同时担任列宁的秘书——译者注。

中央书库转来的苏维埃俄国出版的每种图书的缴送本，各图书馆为他订购了许多书，国外也寄来一些书。然而留在办公室里的那些，只不过是他目前的工作和参考所需的书籍。我发现这些书籍中地图和作战图很多。这些图，有的挂在墙上，有的放在桌子上。当时正值国内战争，主持工农国防委员会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经常利用这些图。

当我走马观花地熟悉了一下列宁的图书室之后，索菲娅·波里索夫娜对我说，明天四点整，要我去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面谈。

我充满着喜悦的心情。要知道，我要见到的人，他的名字正是全世界劳动人民怀着十分爱戴和崇敬的心情一再提到的啊！……

我是一九一七年四月三日第一次见到列宁的。那是他最后一次侨居国外归来，回到了彼得格勒的时候。我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格勒委员会的同志一道，走进芬兰车站的正厅，站在离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和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sup>①</sup>不远的地方……。

后来，在三十年代，在同娜·康·克鲁普斯卡娅的谈话中，谈到在彼得格勒见到列宁的情形。我提醒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亚·米·柯伦泰<sup>②</sup>当时曾送给她一束红玫瑰和石竹花。克鲁普斯卡娅说：

“当时我很激动，怎么就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也很激动。”

---

① 即克鲁普斯卡娅（1869—1939），列宁夫人和战友——译者注。

② 柯伦泰（1872—1952），苏联职业革命家，1921—1922年任共产国际国际妇女书记处书记——译者注。

……明天我又要见到列宁了，并要同他谈话。

一九二〇年三月十四日，在约定的时间，我怀着忐忑的心情，准时步入了人民委员会会议厅的大门，一眼就看见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他刚从自己的办公室里出来，穿着一件大衣，看样子，打算到什么地方去。我站住了，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多亏人民委员会的助理秘书尼·格·克拉辛娜替我解了围。

她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图书管理员来了，要跟您谈谈工作。”

列宁微笑着，走到我跟前，伸出手说：“您好！这么说，您要来做图书管理员罗？”

我那忐忑的心情一下子不知跑到哪里去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让我坐下，问我来：

“您是专家吗？是否熟知图书馆业务？”

我回答说：“没有受过专门训练，但我爱书，并有一些图书工作经验。”

“您能随时弄到我所需要的书吗？”

“我尽力去做。”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看了看我，思索了一会儿，好象在考虑着什么，接着说：

“喏，那您就熟悉一下我的图书室吧。”

“我已经看了看图书室。”我脱口而出。

“什么时候？！”

“昨天。”

列宁对此有些惊奇。我解释说，昨天我来过，并依照勃里奇金娜的建议稍微熟悉了一下图书室。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听了后说：

“您明天就来工作吧。再见！”

## “有什么新书吗?”

头两年，我一边在列宁的图书室里工作，一边在国家出版局工作。我是这样安排的：上半天在出版局工作，然后到人民委员会去。在人民委员会我搞图书馆工作：浏览新收到的图书（这些图书都是定期成批收到的），挑选一些在我看来是最需要的图书，把它放在直对着列宁办公桌的一张桌子上。登记新出版的书（为此专设了一个登记簿），编制目录卡片，整理书柜，收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所要的书籍，向其他图书馆借阅列宁所需要的图书。

午休之后（通常是在晚上六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走进办公室。直到现在，这难以忘却的情景仍在我的脑海里。春天，明媚的阳光射进办公室的窗子，光线把房门照得亮堂堂，列宁走进来了。他一手遮着光，精力充沛，神采奕奕地

说：

“啊，图书管理员已在这里了，您好！有什么新书吗？”接着他便浏览我挑出的书，把一些书放到一边。

“这些书我要带走，”列宁说，而每次总要补充一句：“您要注意我带到住宅去的都是些什么书。”

其余的图书，我暂时放在书柜的下层。后来我又把那些书放到另一间屋里的书架上，或者送给别的图书馆。

列宁读过的图书带回来时，许多书上都有批注：“列宁”、“列宁藏书”、“特别保存”、“放在列宁的桌上”、“放在我的图书室里”，等等。有时他在图书、杂志的封面上写